"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清代中国" 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选登

"十二字头"与清代满文语学

马 腾

［**摘要**］在清代的满文教学中，满文"十二字头"是当时认字读本与满文初级教育的基础。本文从教育史与版本学的角度考察"十二字头"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认为"十二字头"的结构是满洲人的独特产物，有别于已有的蒙文字母表。入关之后，代表满文教学传统的"十二字头"与汉人的启蒙书一并成为双语教育的重要教材。最初的《十二字头》版本比较简单，可看作利于口授的助忆术性字母表。而清中叶以后，《十二字头》成为分析字形而有助于自学满文的综合性认字读本。同时，学者也开始借用汉文的传统概念来理解满文"十二字头"。在此过程中，满文字母被理解为与汉字相似的以固定笔画构成的音节字母。于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语言教学传统包容了满文"十二字头"。

［**关键词**］清代　"十二字头"　满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4）-03-0001-11

我们今天称为满文的语言文字，在清代有许多今日少见的不同名称。文字方面，最常见的名称也许是"清文"，但在清代文献中也常常会出现"国书十二字头"之名。"国书十二字头"这个名称的普遍使用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十二字头"在清代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概念。至今，学界研究"十二字头"的学者并不多。其中，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是李盖提与安双成。[①]两位先生皆充分地说明了"十二字头"的结构，而本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十二字头"的历史来源、发展与角色。

与"清文"一样，"国书十二字头"的名称一方面显示满文与统治者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把满语文字特定的秩序之一看作文字的本身。严格说来，所谓"十二字头"与满语文字是有区别的。从文字学角度上看，我们可以把"十二字头"看作一种文字秩序，而从历史与版本学方面看，我们则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初级满文教材的版本体系。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十二字头"的第二个身份，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作满文教材的《十二字头》，笔者也会在文中兼谈当作文字秩序的"十二字头"。

［**收稿日期**］2014-03-21

［**作者简介**］）马腾（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1985—），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生；msoderbl@ princeton. edu

① Louis Ligeti，"À propos de l' écriture mandchou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æ Scientarum Hungaricæ* 2（1952），pp. 235—302；安双成：《满文十二字头我见》，载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33—243 页。

一、当作字母秩序的“十二字头”

西方语言学家把满文分析为24—29 个基本字母与 10 个用于转写外文（包括汉文）的次要字母。① 清人对满文的认识与现代人的理解很不一样。在清人的眼里，满文并不是表示音素的字母符号（letters），而是表示音节的符号。于是，清人把满文的符号看作 1300—1400 余音节，并按照这批音节的音韵结构，把它们整理为十二个小组。这十二个小组就是所谓的“十二字头”（满文为 juwan juwe uju，在清代也译为“十二篇”）。虽然把小组称为“头”，但它们不是按照音节最初的部分排列，而是按照其韵尾编排。“十二字头”当中，每篇各有不一样的韵尾。第一字头的韵尾为令韵尾，就是说第一字头没有韵尾。第二字头的韵尾是 -i，第三字头的是 -r 等等，一直到第十二字头的韵尾 -m。我们可以将十二个韵尾的秩序称为“十二字头”的“外部秩序”。每个字头内还有一个“内部秩序”。字头的内部秩序就是第一字头的约 130 个无韵尾的音节。由于“十二字头”的第一字头没有韵尾，这 130 左右的音节字就等于第一字头。如果在“内部秩序”的每个音节字后面加上韵尾，就得出第二到第十二个字头所包括的音节字。这就是说，“十二字头”的“内部秩序”在每个字头重复地出现。一般来说，清代学习满文的人都是按照“十二字头”的秩序学习满语文字的。

二、“十二字头”的来源

学界虽然对满语文字的来源问题做过不少研究②，但对于满文被整理为由十二个小组构成的“十二字头”音节表的准确时间，到现在仍没有取得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第一，“十二字头”入关前已经出现过；第二，“十二字头”是满族人的独特产物，而不是从蒙古人那里借过来的。笔者在下文中将展开论述。

笔者所说的满文“十二字头”是满族人自己的产物，但这并不代表它完全没有受到蒙古人的影响。如果我们看刚才提及的称为“十二字头”的“内部秩序”，就可以看出蒙文字母的整理秩序对“十二字头”的影响。虽然蒙古的资料当中能看到的几种字母秩序各有异，但基本上，蒙文的循序与满文“十二字头”的内部秩序相似。③ 可是，蒙古人似乎没有像满族人那样把自己的文字整理为由十二个小组构成的音节表。十二个小组的音节表是满族人 17 世纪前半叶创造的独特产物。

满族人创造“十二字头”的根据，可以在早期的资料找到。我们虽然看不到入关前的关于“十二字头”的完整的资料，它的名称实际上在资料中多次出现。然而，记载满文创造的《太祖

---

① 见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2nd edition (Honolulu: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ʻi at Mānoa), p. 16.

② 研究满文的创造与改革问题有：关克笑：《老满文改革时间考》，《满语研究》1997 年第 25 卷第 2 期，第 12—17 页；Tatiana A. Pang, “The Manchu Script Reform of 1632: New Data and New Questions,” in *Writing in the Altaic World*, edited by Juha Janhunen and Volker Rybatzki (Helsinki: The Finnish Oriental Society, 1999), pp. 201—206; Michael Weiers, “Ein Blockdrucktext betreffend die orthographische Präzisierung der Buchstaben ohne Punkte und Kreise durch Dahai,”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9 (1999), pp. 87—95; Michael Weiers, “Einige Bemerk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Entwicklung der mandschurischen Schrift,” *Acta Orientalia Academiæ Scientiarum Hungaricæ* 55. 1—2 (2002), pp. 269—279；张虹：《老满文改革的初始时间》，《满语研究》2006 年第 43 卷第 2 期，第 28—31 页。

③ György Kara, “Aramaic Scripts for Altaic Languages,” in *The World' s Writing Systems*, edited by Peter T. Daniels and William B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45.

实录》并没提“十二字头”的名称①。最早提出“十二字头”名称的资料则应为《满文原档》（亦称《旧满洲档》）。《满文原档》中有一件没有标出时间，但可以推断出大约写于1632年二月至四月的木刻文本，是提出“十二字头”名称最早的一手资料②。另外，《满文原档》也包括一件手写文件，时间比木刻本晚一些。此手写文件不仅提出“十二字头”的名称，而且还说明“十二字头”的主要用途：此文件把“十二字头”描写为“tacime hûlara juwan juwe uju”，即“为学习而诵读的十二字头”③。在这儿我们就已经能看出“十二字头”的教学作用。在入关后的资料中，此作用更加突出。

三、“十二字头”的作用

“十二字头”的名称虽然在入关前已经出现，但最初介绍“十二字头”结构的资料则是于入关以后出现，确切地说是1647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10—1677）写了有关满族人的报告。其中提到：

> 他们（指满族人）有文字，但没有学者。（中略）辅音字母与我们的（即欧洲人的）一样。然而，他们老是混淆而分不开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他们把辅音字母结为音节，以构成十二篇，由这样来教小孩学习满文。④

在整个清代直至清末，帮助孩童学习满文是“十二字头”的一大作用。从欧洲人的角度看，清人的这个由十二小组构成的字母表很独特。比如1849年，当时在广州的英国翻译密迪乐（Thomas Meadows）给他在欧洲的读者说明了清人教满文的时候不用字母而用音节的概念。他在文章中写道：

> 学习满文的小男孩不念“L加A成LA，L加O成LO”等样子，而教师们教他们直接念“LA、LO”等等。⑤

以上引文不仅说明欧洲人对“十二字头”的好奇，也能够说明“十二字头”在满文教学当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虽然时隔两个世纪，我们依然可以从两个外国经历者的评论中看出同一个以背诵音节为主的口授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很有可能在关外时期已经使用，但目前还缺乏资料进行进一步的确证。然而，清人入关后，满文在清代社会的情况突然改变了。在关外时，满文是满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民众使用的主要语言。虽然有学问的人也可能精通蒙文和汉文，但满文还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言。但入关后情况就逐渐开始改变。康熙末年，北京的旗人大概会说满、汉两种语言。⑥ 尽管不习惯用文言文的满族高官一直到18世纪中叶依旧存在，

---

① 勒德洪校：《daicing gurun-i taidzu horonggo aduringge hûwangdi yargiyan kooli》（太祖武皇帝实录），1686年修订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片，第二册，sohon ulgiyan aniya，juwe biya之下（满文）；《大清满洲实录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8－110页（满、汉文），1739年修订本，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

② 《满文原档》，第5册，第139页，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该文件的大概记载时间出于Weiers，“Ein Blockdrucktext”。

③ 《满文原档》第8册，383页；Weiers，“Ein Blockdrucktext,” p. 88.

④ 笔者翻译的是Sebes的英文译文：“They have an alphabet but no learned persons … The consonants are the same as ours. However, they canno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vowels and constantly mix them up. They teach the children the consonants joined together in syllables, thus making twelve chapters.”见Joseph S. Sebes，“A Description of the Tartars（Manchus）by the Jesuit Gabriel de Magalhães in 1647 When he First Encountered Them at the Time of Their Conquest of China,” Manchu Studies Newsletter 4（1981—1982）, p. 6.

⑤ 原文为：“Manchu boys when learning, instead of saying l, a－la; l, o－lo; &c., are taught at once to say la, lo, &c.”见Thomas Taylor Meadows, *Manchu Literature*, *With the Original Texts*, *Prefaced by an Essay on the Language*（Canton: Press of S. Wells Williams, 1984）, p. 3.

⑥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59页。

但雍正以后，旗人的满语水平还是开始下降。[1] 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满文的人一般也在研习汉文。在这特殊的新时期，满族人的独特产物“十二字头”的功用也有所改变。在关外，“十二字头”一般都用于教会说满语而不认字的小孩。入关后，接触“十二字头”的学生群体则更加多元化。特别在康熙年间，不少汉人也开始学习并研究满文，这批人包括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与官员。对他们而言，满语是第二种语言，满文是第二种文字。可是，不仅这批新生与入关前学习满文的人有所区别，入关后第二、第三代旗人也跟入关前接触“十二字头”的满族小孩不一样了。在北京学习满文的小孩子除了满文以外，还需要学习别的知识。他们也学习汉文，而学会认字以后，还要继续学习当时的统治意识形态的伦理等知识。在这个情况下，“十二字头”就成了双语启蒙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入关后满文学习所面临的这种新形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十二字头”的形式须为了适应新读者的需要而有所改变。第二，汉文文化水平已经很高的读者接触了满文“十二字头”而有新的启发。第三，这种启示再往下引起了这些文人用汉文的文字与音韵学的知识来分析与研究“十二字头”。这几点是我们通过“十二字头”形式发展演变而看出来的。

一开始，“十二字头”存在一个双语、综合性教育制度。此为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是说学生不仅读“十二字头”，把它读完之后，他们一般继续读其他课本。尚玉章（生卒年不明）概括了当时对“十二字头”之作用的看法：“人皆曰：清书易学，止将十二乌朱（即满文 uju，“头”）之字认熟，复读杂话数本，粗粗得成为不难。”与这些人不同，尚玉章自己并不觉得这么容易：“吾未之敢信也。”[2] 可是无论如何，尚玉章的话说明，当时的人认为满文教学以“十二字头”为始，以所谓“杂话本”为终。除此之外，尚玉章提出的“杂话本”说显示当时满文教育和汉文教育具有类似之处。

张志公曾指出，明清汉文初级教育一方面包括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另一方面包括通俗的所谓“杂字”书。[3]“杂字”的名称与尚玉章所说的“杂话本”相似，表示满、汉两种语文的初级教育有相同之处。此外，入关后“三百千”三书也有了双语的满汉本。[4] 学生把“十二字头”读完以后开始学习这三本书。我们继续看有关资料就会发现，清代满文教育不仅受了汉文教课本的影响，也受了汉文教学方法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试见康熙年间满文教学家沈启亮（约 1645 年生）对自己接受的教育方法之所做的评论。沈启亮小时候学习《百家姓》，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

> 余五岁入小学。师以方块纸写字与识之，随讲一字之义。记熟多字，遂聚成一句之义。反复破讲。一日，余自聚成“赵、钱、孙、李”一句，问师何义。师曰：“此无义也。”余曰：“师有云是书有义，何事向无义？既无义，读之何义？”师曰：“此不过教你记姓氏用的，原不曾教你在文义上用的来。”[5]

沈启亮的这些评论虽然只想表示他小时候对自己接受之《百家姓》的教育的不满意，但他也提出了传统教育的一个特点，正如张志公所概括的：“在这个集中识字的阶段，以教会儿童认

---

①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94—295.

② 尚玉章：《清文虚字讲约》，1724 年新刊，第 8a 页。

③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年，第 27—32 页。

④ 池上二郎：《ヨーロッパにある満洲語文献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 45 卷第 3 号（1962 年），第 106—108，111 页；神田信夫：《欧米現存の満洲語文献》，《東洋学報》第 48 卷第 2 号（1965 年），第 87—89 页；Kanda Nobuo, “Pres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of Manchu Literatur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26 (1968), pp. 69—79, 89—90。

⑤ 沈启亮：《御制百家姓满汉合集 ioi jy be giya sing》，1693 年刻本，第 1a 页。

字为主，至于每个字怎么讲，要求很低，怎么用，可以说完全不要求。”[①] 清初，满文教育也用了类似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从沈启亮首刊的《十二字头》看出这一点。

四、《十二字头》之原始面貌

汉人沈启亮首次刊刻的《十二字头》不是现存最早的《十二字头》版本，但其面貌看起来比其他版本更古老。沈启亮最初于 1682 年出版了《十二字头》，但此版本现已不存，留下来的只有 1713 年的第二版。[②] 这本《十二字头》是满汉词典《大清全书》的附录《清书指南》的一部分。像《清书指南》的其他部分一样，《十二字头》不是沈的原作，而是他自己学满文时所搜集的资料之一。与其他版本对比，此本《十二字头》较为朴素，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全书几乎没有汉字。此书每页含有一个“字头”，上面用汉字表示该“字头”是十二字头中的第几，但除了这个符号以外，该书全是满文，没有别的汉字。这就是说，这本《十二字头》不过是一个满文字母表而已。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它在教学方面的作用很重要：用这本《十二字头》学习的人，无论他是个已经会说满语而不认字的旗人，还是满语满文皆不会的汉人，他都无法单靠这个版本学习满文字母。《清书指南》本《十二字头》的满文字母没有音训，也没有对字体笔画的介绍或说明。与其说这本《十二字头》是学习满文的课本，不如说它是满文教师的助忆术本（mnemonic device），利于口授满文。于是，以此版本为基础的教学来讲，我们可以说它大概与张志公所介绍的汉文教学相似，即它是以口授、背诵、认字为主的教学方法，不包括任何关于写字的指示。

沈启亮之后，单独的满文版《十二字头》也曾几次再现。1780、1792 年刊刻的富俊所编词典《三合便览》所包括的满文《十二字头》是其中之一，[③] 再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个清代后期的刻本。后者虽然包括汉文注语，但与《清书指南》本相似，没有音训。它的刊刻时间不详，但其面貌很像官方词典《清文鉴》的“总纲”（uheri hešen），很可能是以“总纲”为基础而编的《十二字头》。[④] 虽然这本《十二字头》也包括一些对字形的介绍，其与《三合便览》等 18 世纪（甚至 19 世纪）的《十二字头》版本的存在，说明口授的教学方法到清末大概还一直流行。

这些版本缺乏音训与对字形的介绍，说明口授教育的前提是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况且，因为这种教学方法略于书写指示，学生只能跟着老师大声念字，然后自己背诵。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教育的目的大概只是记住《十二字头》的内容。康熙以降，此种情况在新式《十二字头》版本开始有所改变。

五、用来自学的《十二字头》

《十二字头》的最原始面貌业已不存。看现存最早的《十二字头》版本，我们就发现它是能够用来自学的。这个与《清书指南》本《十二字头》很不一样的版本是汉人廖纶玑所编的《十二字头》。此书前载《十二字头引》写于 1670 年。全书首次于 1671 年在江西出版，当作汉文字典《正字通》的附录。跟《清书指南》相比，廖纶玑的《十二字头》的最大特点是它用汉字来

---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第 32 页。

② 沈启亮：《大清全书 daicing gurun-i yooni bithe》，1713 年新刊。此版本的《十二字头》与其他的相比也有一些别的特点，这里不赘言。

③ 富俊：《三合便览 ilan hacin-i gisun kamcibuha tuwara de ja obuha bithe》，1780、1792 年刻本。

④ 无名氏：《十二字头》，清刻本，全一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Ma5806. 02/4131［注：两个不同的书都有这个编号］）。

表示音训。即字母表中，廖在满文音节字母旁边加上了与其读音相似的汉字。按照廖的说明，这些汉字音训是为了改良汉人学习满文的方法而加的。廖说：

> 于光天化日者，满与汉并书，俾满汉人通晓也。夫人不知满语者，字虽工，仅得象形之表；徒知点画，不能成言。不学满字者，音未习，欲骤学满语为难。故习字必先肖唇类，而后语义可通也。①

在廖纶玑看来，汉人需要先学会满文的读音，才能开始学习写字。虽然他的版本因为加上了音训，表示满文学习已经开始离开了必须依靠老师的口授教学方法，但廖还是指出读音在教学中的突出位置。可是廖虽然想给学习满语的汉人提供可靠的材料，但是他自己也认识到他所加的汉文音训并不全。廖的《十二字头》写于三藩之乱之前，当时满文语学还很不发达。廖认识到这一点，并说："至音字有未能尽合者，则俟高明详核之。"②廖纶玑的《十二字头》虽然缺点不少，但它的出版在满文教育史上还是有很大的意义。

几十年后，廖纶玑的《十二字头》再次在南京出版。1699 年，凌绍雯与陈可臣出版的《新刻清书全集》，包括了《十二字头》。《清书全集》，面貌典雅，精工细作。凌与陈预料此书的读者应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精英阶层，就是有望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汉族人士。其书《凡例》指出："清书唯以十二字头为主，（中略）其文分合综晰蕴义最弘，为初学入德之门。其书悉本《正字通》所载官学刻本（即廖纶玑本），音释满汉字样，并所注汉字俱系北韵。"③

1701 年，再次出现了一本新本《十二字头》。④ 此书封面标出了"沈启亮校正"，但序文只引沈之言，不是他直接写的。与廖纶玑相似，1701 年本《十二字头》的序文重视满文的读音，而不是书写。跟廖纶玑本一样，此本好像是为了帮助自学者而编的。其首次出版之后，以 1701 年本为基础的版本在北京反复刊刻。1733 年，谿霞出版了《满汉全字十二头》。此书的体例与序文，虽然借自 1701 年本，但并不提及其来源。其序文也指出记住读音之需要。跟以往版本一样，谿霞重视记诵，而不是书写："此乃万部满洲书之总领也。当要将头一篇，百千万览，熟习读透。"⑤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序文和注文所强调的重点仍然是满文的读音。谿霞的版本质量很差，刻工不精，很明显属廉价坊刻本一类。而且，此书坊好像反复把它重印出版。1861 年出现的《满汉十二头》就是其中一例。⑥ 这个版本虽然明明是谿霞本的新刻本，也包括其他版本的一些痕迹，第七字头之后，第八字头照旧继承，但书耳的标题却改称《清汉对学千话谱》，页码重新从"一"开始。看起来，这版本由两个不同而相似的《十二字头》版本构成。这表示出 18、19 世纪的《十二字头》的坊刻本甚多，流传较广。除了之前所提及的与廖纶玑本相似的刻本之外，现存的也有类似的抄本。⑦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抄本在清代应该更普遍。

总而言之，与廖纶玑的汉文音训本《十二字头》相似的版本很多，影响很大。虽然这些版本利于自学，但其序文与注文的形式还是强调以记住读音为主的教学方法，这一满文教育精神到 19 世纪一直都还很流行。我们还可以在另外一个满文的课本中看到如下双语对话：

> age si ai bithe be hûlame bi，阿哥你读什么书呢？/bi juwan juwe ujui bithe be hûlame wajiha，我念完十二个头儿了。/te geli aisilara gisun-i bithe be hûlame bi，如今又念助语书呢？/ age sini taciha gisun be gemu，ejehebio，阿哥你所学的话都记得么？/mini taciha gisun be

---

① 廖纶玑，《十二字头引》，载张自烈《正字通》，1671 年刊，工人出版社，1996 年影印本，第 1b—2b 页。
② 廖纶玑：《十二字头引》，第 3b 页。
③ 凌绍雯、陈可臣：《新刻清书全集》，1699 年刻本，"凡例"，第 1a 页。
④ 即《笺注十二字头》，1701 年刻本，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残本。
⑤ 谿霞：《满汉全字十二头》，1733 年刻本，第 1a—b 页。
⑥ 《满汉十二头》，1861 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X/419. 1/0033）。
⑦ 故宫博物院：《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第 68—69 页有介绍。

gemu ejehebi，我所学的话皆记得。①

这段话也说明，在很多人看来，《十二字头》首先是要背的。对话中的“阿哥”也许是用以上介绍的《十二字头》版本自学满文，但他还是主要用它背诵与记住满文。然而，康雍年间，新的教学方法逐渐出现了，而这新的方法与汉文的教育发展同步而行。

六、《十二字头》与写字教育、满文字母分析之关系

最近，虞莉指出清代汉文教育开始了离开所谓的“口授—听受”（oral-aural）的方法，即张志公指出的传统教育的方法。代替这个传统方法的是不仅注意读音而且也注意字形的新方法。②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发展趋势也可以在满文教育中看出。《十二字头》的版本演变表明，看重字形这个新发展影响了字母表的面貌。与此同时，可以用于讨论并分析满文字母的汉文术语逐渐形成。为了更方便说明问题，笔者于下文中举出几个例子。

汉族文人对满语文字的兴趣与分析早在康熙年间已经开始了。第一部分析满文字体的坊刻本《十二字头集注》早在1686年就出现了，其作者为编《清书指南》的沈启亮。沈启亮是康熙末年满文教育界的重要人物，但《十二字头集注》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虽然其序文在18、19世纪的几部《十二字头》的版本里被引用过，③ 但其继承者没有使用沈启亮对字体的分析。与廖纶玑相反，沈启亮采用“夫清字既熟，而满音自晓”的口号，④ 强调了认字在满文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沈启亮就“细讲连字之法”介绍了满文音节字的组成部分，即其所谓的“成字”的方法。“成字”部分的说明使用了“勾”、“长撇”、“短撇”、“捺脚”、“肚”等术语。⑤ 此术语当中，有的引用了汉字传统概念，有的翻译了蒙满传统的词语。此二种词语在后世学者所用的术语里也能看出。在《十二字头集注》一书，沈启亮开创了满文书写教育。部分的《十二字头集注》的术语也出现在后世的资料里，但与启亮的书不是完全一致。这表明清代满文写字教育的一个特点：一定的而不完整的统一性。

康熙末年的其他学者也有关注满文。例如，1703年江西的音韵学家熊士伯（生卒年不详）在其著作《等切元声》里讲到了满语文字。在此书的“阅清书字头”一卷中，熊主要研究了满语的语音，同时也分析了满文字体。熊认为满文字母可以跟汉字一样，看作是由固定的笔画构成的文字。熊把“撇”等的来自汉文文字学的概念转用于满文，以识别满字的组成部分。除了此种传统术语以外，他也用了描写性的术语，如用“曲画”、“直画”、“斜画”等词语说明满文字母的结构。⑥ 他通过这样的分析，把满文《十二字头》的1300多个音节字母理解为十几种笔画。从理论方面来说，熊士伯的体系更为简单。

几十年后，类似的分析再次出现。1727年，齐曙初继承了先兄的业务，写成了《翻译发微》。⑦ 异于《等切元声》，此书是为了加强满文教学而写的。在“字母辨”一卷，我们能看出作者对满文字母的分析。齐曙初等没有像熊士伯那样分析满字笔画，但分析了隐藏在第二到第十二字头的第一字头的“内部秩序”。齐曙初等分析出来的结果，可以被看作“十二字头”的理论

---

① 博赫：《清语易言 manju gisun be ja-i gisurere bithe》，1766年刻本，第4a页。

② Li Yu，“Character Recognition：A New Method of Learning to Rea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33.2（2012），pp. 1—39.

③ 《笺注十二字头》等有关《十二字头》版本引用了《十二字头集注》的序文部分。

④ 沈启亮：《十二字头集注》，1786年刻本，序，第2b页，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藏本。

⑤ 《十二字头集注》，“读法”，1a页；“十二字头”，第3a、7a页。

⑥ 熊士伯：《等切元声》1703年刻本，第九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219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

⑦ 齐曙初等：《翻译发微》，第一册，1727年抄本，大连图书馆藏（M22－161B）。

性概括，适合于已会汉文的学生。因为《翻译发微》并未刊刻，其对满文教学界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是，1730 年，寿平在北京出版了《清文启蒙》。[①] 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之后多次重刊，流传很广。《清文启蒙》是一个综合性的课本，提供了丰富的初级和中级的满文资料。卷一的“满洲十二字头单字联字指南”（manju hergen-i juwan juwe uju，emteli hergen，holboho hergen-i jy nan）包括了《十二字头》。寿平的《十二字头》跟廖纶玑的很不一样。首先，寿平把满文字母抽象化。为了让读者更容易学会满字的组成部分，在字母表中，他在整字的旁边标出了该词的组成部分。其次，在每个字头之后，寿平也通过几个例子先说明字母怎么构成音节，再解释有关构成整词的书写规律。《清文启蒙》富于对字形的解释，代表满文教学新方法的成熟阶段。寿平此书的出版表明字形的分析在雍正年间成为了满文教育的主流。

1746 年，北京的书坊再出现了一本满文教学的大作：《一学三贯清文鉴》。这本书的作者屯图在“凡例”中提出了其书跟一般满文《十二字头》之不同处：“则十二字头原属入门要诀。第学之者，非解说不能自明。（中略）且示以连字之法，无论满汉之人，不必师承皆可一目了然。”[②] 在这里，屯图提出了用他的《十二字头》足以自学的原因之一，是其对字形的解释。与寿平相似，他在“连字”卷内介绍了文字的抽象化的组成部分。

在满文教学家创作包括对字形解释的课本的同时，1787 年，官方《皇朝通志》之编者也提到了满文“十二字头”。在此书之“六书略”部分，满文字母的组成部分被介绍为“a，字之牙；fuka 字之圈；tongki 字之点；ucehen 字之尾”。[③] 虽然远远没有介绍“十二字头”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但《皇朝通志》把满文字分析为几个固定部分，这与熊士伯的方法相似。其最大特点是，与熊士伯相反，它使用了满语的术语，而不是使用“撇”等汉文的传统概念来说明“十二字头”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些术语的历史悠远。“牙”（a）、“尾”（ucehen）等概念皆来源于蒙文之“sidün”（牙）、“segül”（尾）等。[④] 在《皇朝通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来自蒙文的概念被汉文传统所包容。跟熊士伯一样，《皇朝通志》是从理论角度而非教学角度介绍了满文字母。

另外，我们也能在其他的 18、19 世纪的文献中找到有关满文“十二字头”的讨论与分析。例如，大连图书馆藏的清抄本《清文后学津筏》有一卷“国书疑议解”。其中，作者为了提高满文教学的效率而分析了“十二字头”。该书作者为了简化书写教育，就“以便童蒙认习”而把几个字形接近的音节字“联集”在一起。[⑤] 像《皇朝通志》一样，《清文后学津筏》用了“牙”、“尾”等概念描写满文字母的组成部分。《清文后学津筏》的作者好像想把满文的结构合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把一些理学的概念用到字母成分上。

再举大连图书馆藏的抄本《满汉字音联注释文》与跟它有关的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初学满文指蒙歌》。[⑥] 这两个大约完成于同治年间的抄本兼用表格、口诀来给学生分析与介绍“十

---

① 寿平：《清文启蒙 cing wen ki meng bithe》，1730 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

② 屯图：《一学三贯清文鉴 emu be tacifi ilan be hafukiyara manju gisun-i buleku bithe》，“凡例”，第 1b 页，1746 年刻本，《故宫珍本丛刊》第 723 册，海南出版社，2001 年影印本。

③ 《钦定皇朝通志》，第十一卷，第 9a 页，约 1782—1787 年间编，精写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44 册影印本。

④ 有关书的文化的蒙文术语，见 A. Róna-Tas，“Some Notes on the Terminology of Mongolian Writing,” *Acta Orientalia Academiæ Scientarum Hungaricæ* 18（1965），pp. 119—147。

⑤ 无名氏：《清文后学津筏 manju gisun-i amaga tacire ursebe ibebure tasan-i bithe》，全二册，第一册（无页码），清抄本，大连图书馆藏（M22－121）。

⑥ 无名氏：《满汉字音联注释文》，全二册，清抄本，大连图书馆藏（M22－149）；无名氏：《初学满文指蒙歌 manju hergen be tuktan tacire de jorišame ulhibure ucun》，全一册，清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41. 5511/7）。

二字头"。虽然其用表格分析字形的方法属于以书写为主的满文教育阶段，但书中之口诀却仍然指出背诵的重要。例如，口诀之一指出：满语文字"若能常时多记诵，何虑清文不贯通"。①《满汉字音联注释文》也使用"牙"、"尾"来分析满文字母，并加上"泡"（指满文字母中圈形部分）、"背窝"（-ng 字尾的半圈部分）等概念。这两个抄本之外，类似的情况在 19 世纪的比较朴素的满文课本里也能看到。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一个清抄本《十二字头》，其中字母表的注文用"牙"、"尾"、"背弓"等概念说明音节字的结构。②

这本《十二字头》也包括一首口诀。这首口诀在说明满文的两个类似的字尾的用法时，也用上了"双点"、"弓"等在别的资料也出现过的术语。实际上，这首口诀并不是该抄本的作者编写的。早在 1809 年出版的《清文指要》的满汉对话本里已经出现了一首"七言六句歌"（nadan hergen ninggun gisun-i ucun），内容与哈佛燕京抄本的口诀基本一致。③ 此外，大连图书馆藏的《满文字头》抄本与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的 1902 年（badarangge doro-i orin jakûci aniya，即光绪 28 年）抄下来的《十二字头》也包括这首口诀。④

除了《清文指要》里的口诀以外，还有意思雷同而言辞有异的口诀。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藏的写于 1830 年之后的《初学辨识清字须知》里有一首"辨字歌"。与《清文指要》的口诀一样，"辨字歌"提到"双点"，但不用"弓"而用"湾"。⑤ 在说明音节字的组成部分时，《初学辨识清字须知》也用了一些别的有异于以上所提到的术语，如"背锅儿"、"旁点"、"长腰儿"等。

同样的口诀在刻本、抄本重复出现的现象表明，到了 19 世纪，满文初级教育形成了一定的统一性。然而，"泡"、"背窝"等新概念在别的资料中出现的现象也说明，虽然康熙朝以后，大批满文教学家或音韵学家对"十二字头"包括的满文字母做过研究，但他们分析字形所用的术语还不完全一致。

讨论清代"十二字头"在满语文字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康熙朝以后，文献中开始出现对"十二字头"字形的分析与介绍。一方面，对语言与音韵学感兴趣的汉人（如熊士伯）开始研究满文字母，并使用汉文文字学的一些传统概念如固定笔画的名称，来研究满文字母的结构。另一方面，专修满文教学的人士也把字形之分析带入满文初级课本当中。沈启亮、寿平、屯图等教学家离开了口授的教学方法，而编了新的一种有助于自学的满文课本。与廖纶玑等的自学《十二字头》本相比，寿平、屯图等更努力给读者介绍满文字母应该怎么写，字形应该怎么理解。满语文字学的这种新发展趋势逐步引起了新一套术语的出现。这套术语代表了其多元性之来源，融括了从汉文文字学借来的概念与蒙满传统的意译词。术语的不一致性，说明在清代满文语学没有形成为一门专业的学问，而依然存在于传统文字和音韵学与启蒙教育及教学之中。然而，无论作者的身份与写书目的如何不一样，18 世纪以来，对满文字母的讨论与研究一概依赖汉文表达，这说明这段时期学习满文的人士都会汉语。即，自学与自己研究满文的人士学满文之前已经受了汉文教育。以汉文为主要语言的背景可以说影响了对满文字体的分析。虽然用来说明满文字的组成部分的术语不完全一致，学者皆把满文字看作音节字。换而言之，对他们来说，满文的组成部分不是带音字母（letters），而是笔画。按照这种看法而推，满文字的结构与汉字相似，两个都是音节，两个都以笔画而成。

---

① 《满汉字音联注释文》，第一册（无页码）。

② 无名氏：《juwan juwe uju-i bithe》，清抄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Ma5806. 02/4130）。

③ 富俊：《清文指要 manju gisun-i oyonggo jorin-i bithe》，上册，第 15b 页，1809 年刻本，中央民族大学藏本。笔者所看的这部书的版本皆有"嘉庆十四年夏重刻"之称。原本大概更早出现，但我还没看到。

④ 无名氏：《满文字头 manju juwe uju bithe》，第 13a—13b 页，清抄本，大连图书馆藏（M22 - 140）；Irgen Gioro Algitai：《满文十二字头 juwan juwe uju》，1902 年抄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满 92 - 218/4）。

⑤ 无名氏：《初学辨识清字须知》，1830 年之后的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经 91612527 2323474）。

七、余论

除本文所提到的以外，还有很多与“十二字头”有关的问题，如满文“十二字头”如何在词典编纂、语音转写与分析等多个方面影响了清代语言学史。① 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十二字头”与清代统治者对满汉语音转写的规范化有密切的关系，代表性的词典之一是乾隆朝的《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关“十二字头”的满文语学和清朝多语行政制度与大量的翻译者的培养有很大关系。笔者希望本文能进一步推动该项研究，增进学界对“十二字头”在满文教育史上的认识，并希望笔者的讨论能够给满文“十二字头”在清代满文教育与语言学上作一初步的探索。本文的要旨在于：首先，介绍现存最早与影响最大的《十二字头》版本。其次，探讨《十二字头》在清代语文教育范围的位置与其跟汉文启蒙教育之关系。再次，本文还尝试设定一个清代满文教学的发展趋势，即从完全依靠教师的口头指示、不包括书写成分的满文教育，向适于自学、包括字形之分析与书写之指示的教学方式发展，而“十二字头”因此更容易被清人学习和理解。

（此文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春花、项旋与郑冰瑜的帮助，特此感谢。）

主要参考文献

[1] 安双成：《满文十二字头我见》，载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
[2] 博赫：《清语易言 manju gisun be ja-i gisurere bithe》，1766 年刻本。
[3] 春花：《论清代满蒙文“音序词典”的发展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4 期。
[4] 春花：《乾隆敕修〈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及其影响》，《历史档案》2008 年第 1 期。
[5]《大清满洲实录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1739 年修订本，台北：华文书局，1969 年影印本。
[6]《初学辨识清字须知》，1830 年之后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
[7]《初学满文指蒙歌 manju hergen be tuktan tacire de jorišame ulhibure ucun》，清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8] 富俊：《三合便览 ilan hacin-i gisun kamcibuha tuwara de ja obuha bithe》，1780、1792 年刻本。
[9] 故宫博物院：《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10]《笺注十二字头》，1701 年刻本，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残本。
[11] Irgen Gioro Algitai：《满文十二字头 juwan juwe uju》，1902 年抄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
[12]《juwan juwe uju-i bithe》，清抄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
[13] 廖纶玑：《十二字头引》，载张自烈《正字通》，1671 年刊，北京：工人出版社，1996 年影印本。
[14] 凌绍雯、陈可臣：《新刻清书全集》，1699 年刻本。
[15]《满汉十二头》，1861 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16]《满汉字音联注释文》，清抄本，全二册，大连图书馆藏。
[17]《满文原档》，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 年。
[18]《满文字头 manju juwe uju bithe》，清抄本，大连图书馆藏。
[19] 齐曙初等：《翻译发微》，1727 年的抄本，大连图书馆藏。
[20]《钦定皇朝通志》，约 1782—1787 年间编，精写本之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44 册。
[21]《清文后学津筏 manju gisun-i amaga tacire ursebe ibebure tasan-i bithe》，清抄本，全二册，大连图书馆藏。
[22] 沈启亮：《大清全书 daicing gurun-i yooni bithe》，1713 年新刊。
[23] 沈启亮：《十二字头集注》，1786 年刻本，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藏本。
[24] 沈启亮：《御制百家姓满汉合集 ioi jy be giya sing》，1693 年刻本。
[25]《十二字头》，清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全一册。

---

① 与此有关的研究包括：春花：《乾隆敕修〈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及其影响》，《历史档案》2008 年第 1 期；春花：《论清代满蒙文“音序词典”的发展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4 期。

［26］寿平：《清文启蒙 cing wen ki meng bithe》，1730 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
［27］屯图：《一学三贯清文鉴 emu be tacifi ilan be hafukiyara manju gisun-i buleku bithe》，1746 年刻本，《故宫珍本丛刊》第 723 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影印本。
［28］谿霞：《满汉全字十二头》，1733 年刻本。
［29］熊士伯：《等切元声》1703 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219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影印本。
［30］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年。

The "Twelve Heads" and Manchu Language Studies in the Qing Period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msoderbl@princeton. edu)

In Manchu education of the Qing period, the Manchu "twelve heads," a syllabary and language primer,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curriculu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se and evolution of the "twelve head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idea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twelve heads" was an original product of the Manchus, different from Mongolian character lists. After the conquest of China, the "twelve heads," while rooted in the Manchu pedagogical tradition, became part of a bilingual pedagogical paradigm shared with Chinese primers. The original versions of the "twelve heads" were relatively simple character charts to be used as mnemonics. From the mid-Qing onwards, the "twelve heads" developed into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complete with analyses of the script that was suited for self-study. At the same time, scholars tried to make sense of the "twelve heads" using concepts borrowed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process, Manchu writing became understood as consisting of syllabic characters in turn constituted of fixed brush strokes and thus on a par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The Manchu "twelve heads" were eventually integrated into an educational tradition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